

朱光潛後期美學思想述論

蒯大申 著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历史性转折	(1)
第一节 新的起点	(1)
第二节 思想改造运动	(12)
第三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	(21)
第二章 美学大辩论	(29)
第一节 大辩论的先声	(29)
第二节 大辩论的背景	(36)
第三节 政治批判与学术论争	(44)
第三章 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	(55)
第一节 物甲物乙说	(55)
第二节 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	(64)
第三节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	(71)
第四节 美学不能只是一种认识论	(78)
第四章 实践观点的萌芽与形成	(87)

第一节 实践观点的萌芽·····	(87)
第二节 实践观点的形成·····	(94)
第五章 《西方美学史》·····	(105)
第一节 《西方美学史》前对西方美学的译介·····	(105)
第二节 《西方美学史》的指导思想·····	(115)
第三节 《西方美学史》的开创性意义·····	(124)
第六章 浩劫中的悲喜剧·····	(141)
第七章 晚年思想·····	(152)
第一节 《谈美书简》及其他·····	(152)
第二节 实践观点的发展·····	(160)
第三节 人的整体观点·····	(178)
第四节 维柯研究·····	(190)
第五节 海外反响·····	(208)
第八章 暮蔼中的拾穗者·····	(220)
第九章 春蚕到死丝方尽·····	(239)
 附录一 论朱光潜早期文化思想及对其美学的影响·····	 (247)
附录二 论朱光潜的前期文艺功利观·····	(265)
附录三 朱光潜学术年表·····	(278)
 后记·····	 (311)

引 言

朱光潜先生的学术生涯跨越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一生留下了七百万字的著作和译作,他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作出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巨大贡献,其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同其学术研究紧紧融合在一起。

朱光潜先生 1949 年以后的经历和思想演变,曾受到海内外不少人士的关注。其后半生所遭遇的困厄和挑战,远比其前半生为甚。在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均遭受空前压力时,一个真正的学者独立思考、求真求实的品格反而更加凸现出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在他身上所体现出的一代学者风范,将成为一种永远指引后学的不灭精神。

第 1 章

历史性转折

第一节 新的起点

1 朱光潜后期思想的一切变化,都要从 1949 年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巨变谈起。

1948 年 11 月,人民解放军将国民党傅作义部驻守的北平团团围住,隆隆炮声隐约可闻,北平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孤城。北平即将和平解放,是留在北平,接受即将建立的新政权,还是离开北平,跑到当时尚未解放的南京、广州,甚至跑到台湾、海外?一个历史性抉择摆在北京大学许多著名学者和教授面前,也摆在朱光潜面前。

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北平当局加紧了动员知识界知名人士飞往南方的工作,朱光潜也被列入国民党政府拟定的知名人士名单中。南京方面频频发来急电,派来飞机,催促这些人士南

下。蒋介石本人也直接过问此事,并指定由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陈雪屏(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代理部务、国民党青年部部长)还亲自登门力劝朱光潜早日南下。朱光潜在英国留学时,曾与由美国途经英国的陈雪屏相识,陈曾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育学系教授及训导长,因此又有同事之谊。关于这段往事,朱光潜曾回忆道:

记得北京解放前夕,北大同事陈雪屏临走时来我家力劝我走。我问他走到哪里?他说先到南京。我又问,看形势,南京也保不住了,下一步怎么办?他说,最后到台湾。我又问,大陆这一大片江山都保不住,区区台湾孤岛能保得住吗?他说,台湾是美国的战略要地,美国是绝不会放弃的。我对这一点没有他那么大的信心,也感觉到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活不是个滋味。^①

在此关键时刻,中共北平地下党也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劝导这些知名学者留在北平。

位于沙滩的中老胡同 32 号的红漆大门里,住着二十多位北大教授。此刻,各种政治背景的人在教授们的宿舍里进进出出,情势纷乱而又紧迫。12 月 12 日,解放军已经到达海淀。北大校长胡适终于在 12 月 15 日乘南京派来的专机匆匆离开北平。同机离开的还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寅恪一家。12 月 17 日,本来是北大 50 周年校庆,但在大炮和机枪声中,到会者不足

① 《新春寄语台湾的朋友们》,原载《大公报》1974 年 1 月 19 日。见《朱光潜全集》第 10 卷第 423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

百人，庆祝会开得冷冷清清。

此时此刻，朱光潜的内心也十分矛盾。虽说对国民党政权已经失望，但同当时大多数中老年知识分子一样，他对共产党也并无太多了解，再加上自己的复杂经历，对共产党会如何对待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亦心存疑虑，忐忑不安。二十多年后，他说：

我留下时也不是没有思想顾虑的。我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常委，这是尽人皆知的。过去一个共产党人如果落到国民党手里就会关进监狱甚至砍头，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因此，我就怕共产党用同样的办法来对待我。北京解放，我呆在北大宿舍里怀着焦急的心情坐待处理。^①

他曾分别托杭立武和陈源为其谋求联合国文教组织的职位，想远离脚下这块是非之地，但均未成功。1948年4月28日，他致函胡适，希望胡适推荐他去联合国文教组织工作。函云：

适之先生，听说教部拟派一人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之文艺工作，人选尚在物色中，我任教已15年，很想出国一行，藉长见闻，您能否向朱部长为我一推荐？汤先生快回国了，我如果暂去，对学校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希望您能给我一个进修的机会。专颂时祺 光潜拜上 四月廿八日^②

① 《新春寄语台湾的朋友们》，原载《大公报》1974年1月19日。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423页。

② 此函原件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未收入《朱光潜全集》。函中“朱部长”指朱家骅，“汤先生”指汤用彤。

此外，他还曾委托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时在美国加州大学教中文的陈世骧代为联系去夏威夷大学任教，亦未成功。这时，年迈的母亲又在南方的家乡病逝，这更加剧了他的思想斗争。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他头脑里留下一片无法摆脱的阴影。就在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前夕，北京大学一部分学生在民主广场贴出许多大字报和大标语，批判锋芒主要指向沈从文。沈从文是他多年老友，又是同住中老胡同的多年近邻，彼此相处十分融洽，相知甚深。朱光潜一面为老友担心，一面也为自己的前途不安。一些学生将郭沫若 1948 年 3 月在香港的由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委领导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①用大字报抄出。郭沫若在此文中，将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人的作品一律斥为“反动文艺”，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朱光潜是国民党的“男作家”代表，萧乾是“标准的买办型”，并将他们分别贴上“桃红色”、“蓝色”、“黑色”的标签。郭沫若当时被人们视为左翼文艺的“最高领导”，他的看法是否代表共产党对他们这些自由主义文化人的态度和政策？这篇带有明显霸气和偏激情绪的文章，就像是雪上加霜，在朱光潜等人的心头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然而，尽管如此，在去台湾还是留北平这两者之间，他还是下决心选择了后者。“当时也有些进步的朋友向我讲共产党对待旧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我可以照旧教书，劝我不走，于是我

①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载《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1948 年 3 月。1948 年 5 月，邵荃麟又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二辑《人民和文艺》上发表《朱光潜的怯懦和凶残》，文中说朱光潜是“法西斯‘疯狂、残虐和暴乱’的典型”。

就留下来了。”^① 在郑昕、樊弘、袁翰青等人的鼓励下，他果然“拒绝乘蒋介石派到北京的飞机去台湾，自留在北大”。^②

和朱光潜一样，北大绝大部分教授、学者都决定留在北平。有一次，国民党南京政府在一天里派了五架飞机来北平接人，却无人到机场。1949年1月31日，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北平军管会接管了北大。2月1日上午，北平各大专院校师生齐集于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庆祝解放。

2 解放后的中国，到处呈现出一派热烈、光明的景象。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富有活力的时代。新旧变革不仅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成了每个人生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

在朱光潜眼里，新中国的变化是惊人的。由于过去对共产党的了解十分有限，现在亲眼看到共产党人在面对解放初期的各种困难时所表现出的坚毅精神，不由得感到由衷的钦佩。朱光潜谈到他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对共产党的印象时说：“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共产党。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

① 《新春寄语台湾的朋友们》，《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423页。

② 《作者自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6页。

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最感到兴奋的景象。”^① 这是一个希望中国能摆脱贫穷落后,走向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知识分子的心里话。即便在私人通信中,他也由衷地表露出对新中国的赞许和信心。1950年2月27日,他在给某留美同学的信中说:“解放后学校一切认真,师生均感忙迫”,“就一般情形说,各部门均在积极革新,气象与以前大不同;如能维持数年和平局面,努力从事生产事业,则中国转瞬间即成一泱泱大国矣”。他还劝这位同学毕业后早回国,因为国内目前各部门均需要人才。^②

但是,这一切并未抹去朱光潜对自己以往历史的担心。他一面对新中国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感到欢欣,一面又忧心忡忡,忐忑不安。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朱光潜和沈从文等人都榜上无名。朱光潜感到有点不平,心想自己过去在文艺方面也做过一些事情,怎么竟然被一笔抹杀?他思前想后,觉得委屈和不理解。

不久,沈从文因经受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而精神崩溃,有一天竟企图自刭。这无疑又在朱光潜心头抹上一笔浓浓的阴影。欢欣和忧虑、积极和消极、光明和阴霾,在他的内心深处交织在一起。他虽然仍沉默寡言,安详如常,但心底里却埋藏着许多惶惑和忧惧。

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朱光潜真诚地希望自己能赶上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放下过去的历史包袱,赢得新社会的谅解和欢迎,为国家的繁荣进步作出自己

① 《自我检讨》,原载1949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7页。

② 此信原载《留美学生通讯》第四卷第二期(纽约),1950年5月13日。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页。

的贡献。从解放初期几篇“自我检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以一个学者的诚恳和努力,迫切希望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社会。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自我检讨》。^①过去,他从未在大众面前公开检讨过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历史,这对于一个全国知名的学者来说,无论在感情上、理智上,或者是面子上和自尊上,都是一个新的考验。在这篇《自我检讨》里,朱光潜从以往自己所接受的封建教育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说起,检讨了自己过去的政治态度和经历,同时也谈到自己对新社会的认识。

他检讨过去所受的半封建教育和洋教育对自己的影响:

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腐的思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由于机缘的凑合,我在几个英法大学里做了十余年的学生,在资本主义形态的文学、历史和哲学里兜了一些圈子。就在这个时期的开始,中国文化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空前的变动——五四运动。这样大的一次变动掠过我而过,而我却茫然若无其事。这是我生平的大不幸,历史向前走了一长段路,而我还停滞在变动的出发点。我脱离了中国的现实时代。……我受了欧洲经院的“为学问而学问”那个老观念的传染,整天抱着书本子过活,对于大世界中种种现实问题失去了兴趣。^②

① 当时先后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还有费孝通、冯友兰等著名学者。

② 《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5页。

他从来就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存有戒心，取一种敬而远之的躲避态度。这既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又有对现实政治的畏惧。他检讨自己对政治的看法：

实际政治尤其使我望而生畏，仿佛它是一种污糟的东西。二十二年回国，我就在北大外文系任教。当时我的简单的志愿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一点，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假如说我有些微政治意识的话，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①

认为政治污浊而取躲避态度，是他的真实心态，但最后又终究在某种程度上被裹挟了进去，这又是无可奈何的事实。对于后者，他感到愧疚。为什么会被政治卷入呢？他是这样解释的：

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②

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他最后表示：“我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

① 《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5页。

② 《自我检讨》，《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537页。

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于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我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这些优点也许可以做我的新生的萌芽。”熟悉朱光潜为人秉性的人都知道,他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想的。

在这篇《自我检讨》里,朱光潜在不少地方表现出对现实政治斗争的“书生之见”。如他说参加国民党“是我始终引为内疚的一件事”,但“参加一个政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我所感到惭愧的是我以一个主张思想自由者,为了一时的方便,取这种敷衍的态度,参加了我不愿意参加的一个政党”。他觉得,“我的基本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我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偏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把国民党反动派称为“蒋匪帮”的情况下,在当时主要以政治面貌、政治立场来分辨、衡量“敌我”的情况下,还说自己参加国民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可见其书生气之足。不过,恰恰是这种不加矫饰地述说,透露出他的确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派”。人们从这篇检讨里感到他的真诚和毫不做作。

1950年4月,依照政府关于国民党军政人员限期去公安部门登记的规定,朱光潜去北京市公安局登记,接受管制八个月,到1950年12月解除管制。当时虽说是“管制”,但实际上并不限制行动自由,仍可正常生活和工作。在此之前,北京大学撤销了其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职务。^①1950年5月底,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

① 朱光潜从1946年秋复员回北大时起任西语系主任。解放后他曾多次向当时主持校务的汤用彤提出辞职,汤央其勉为其难,继续维持。

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朱光潜与贺麟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到陕西省西安附近的长安县东大村,与当地的干部、农民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一个月,亲眼看到了土地改革这个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大变革。通过参观土地改革,朱光潜对共产党与新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更深入了一些,也更具体化了。

参观团参加了长安县第一期土改工作总结会议,同七百多位县区乡村各级干部生活在一起。会议结束后,他们又随土改工作组来到终南山脚的东大村,一起住在农民家里。开始是参观,后来又亲身参加了工作组的工作。到农民家访问,了解情况,整顿村干部队伍,扩大村农会,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还参加了初步划定阶级成份等一系列工作。

朱光潜把这次参观看作是具体了解人民政府的各级干部怎样进行工作的一次机会,看作是深入了解共产党,深入了解新社会的一次机会。他认真地参加了所有的活动,一边观察,一边思考。他看到乡村干部们办事老练,说话沉着,生活刻苦,作风民主。他慨叹,这些乡村干部“处处都叫我们这批教授不但佩服,而且惭愧”。他看到广大农民群众虽然仍像过去那样勤俭朴实,刻苦耐劳,但他们开会、发言、选举、批评,一切都做得很熟练,显得十分自信、自豪。他真切地感到,中国农村确实已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翻身农民确实已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翁。

从西安回北京后,朱光潜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这次参观土改,使我更具体地“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她的光明前途起了极坚定的信心”。他说,“这是我这次参观土地改革的最

大收获”^①。

土改这一社会变革,给予朱光潜这类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以很大教育。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和大学教授都到农村去参观土改。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1951年3月初到广东侨乡新会、江门、鹤山等地视察土改,回京后,以其所见所闻写了一篇题为《粤中侨乡的土改》的长文,在《光明日报》上连载一个月,引起很大反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去了西安附近的农村,回京后写了一篇《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刊登在1951年3月28日的《光明日报》上。著名学者梁漱溟也到四川省合川县参观土改,回京后写了《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发表在1951年10月的《光明日报》上。

朱光潜等人对土改工作的高度评价和对共产党、新中国认识上的提高,引起了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注意。1951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给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发去的指示中说:“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让他们只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② 毛泽东亲自指示《人民日报》刊载、转载他们的文章,并令新华社在全国各地广播。

① 《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原载195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0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在全国文联和全国政协的组织下,朱光潜还经常有机会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1956年9月,他参观了西安、兰州、玉门油田等地,写下了不少记游诗抒发观感。其中《别长安》一首写道:

西征趁日夕,回首咸阳道。
斜阳照渭水,疏林隐城堡。
昔我来长安,尘埃漫浩浩。
今我来长安,高楼耸天表。
坊曲夸盛唐,视此犹渺小。
寄语长安人,长安真美好。^①

这些诗篇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赞许和肯定。

第二节 思想改造运动

1 朱光潜在解放后遇到的第一次真正严厉的批判,是在1951年秋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及随后开展的旨在清理教育界反革命分子的“忠诚老实运动”中。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

^① 《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44页。

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与反革命，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抛弃原来反动的或错误的阶级立场等”。这场到1952年冬基本结束的“思想改造运动”，可以说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继续。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要解决当时进入党内的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解决他们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党性不纯的问题。而1951年秋开始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要解决解放以后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解决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问题，同时在组织上进行清理。

当时，全国性的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余威犹在^①，思想改造运动中也出现了混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政治压力解决思想问题、人格污辱等现象，使一些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了伤害^②。这场思想改造运动在一代知识分子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运动开始时，朱光潜被指定为工会学习小组长，负责召集西语系教师的政治学习。后来轮到他自己做检查时，便被定为西语系唯一的重点批判对象，最后又被定为北京大学全校几个重

① 批电影《武训传》是解放后思想文化界第一次大规模的批判运动。1985年9月6日，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谈话，说当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粗暴”，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

②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过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伤了一些人，这是不好的。这个缺点，今后必须避免。